

<<梁钊韬先生评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梁钊韬先生评传>>

13位ISBN编号：9787509727690

10位ISBN编号：7509727693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周大鸣 编

页数：20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梁钊韬先生评传&gt;&gt;

## 前言

今年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30周年，周大鸣教授来电称，系庆之际系里决定回顾人类学系的历程，其中有一部分要纪念梁钊韬先生。

因为我是梁钊韬教授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人们习惯称我为“大师兄”或“大弟子”。

今承蒙各位师弟和师兄的善意，要我为此书写几句聊作序言。

我不但欣然接受且不揣冒昧地想谈谈中国人类学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科研为现实服务的问题。

我跟随导师梁钊韬教授学习多年，最深刻的感受之一就是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和一心想提高与增强中国人类学在社会科学界的地位和作用的迫切愿望。

由于极“左”思潮的冲击，西方人类学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不过四五十年就被视作资产阶级学科受到抑制，原有的人类学先后被撤销了，“文化人类学”一词被禁用，甚至成为禁区。

中国的人类学只保留了民族学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研究范围极为有限。

不少人类学专家不是改行就是受到批判，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还有人对我讲，人类学是殖民主义者的工具，达尔文是资产阶级学者，不值得学习，等等。

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想和两个“凡是”仍有影响的艰难条件下，梁钊韬教授不顾年老体弱，不顾理论领域的各种旧框框的束缚，经过多年的奋力筹划，于1981年终于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确立了人类学在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公开地位。

从那时到现在，时间过了二十多年，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人类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中的民族学系开始改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系，社会学系改为社会人类学系，一些科研单位的民族研究所改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

各种以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为名的研究中心也开始建立，各种文化人类学的名著得以翻译和出版，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更令人激动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

人类学得到了党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肯定和认可。

我相信，此时此刻，如果梁钊韬教授在九泉之下能听到这样的讲话，一定会心满意足、喜笑颜开，并为新时期中国人类学地位的提高而欢欣鼓舞。

回顾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史，我们得到一个重要启迪：什么时候人类学关注、研究现实热点问题，为现实社会服务，什么时候人类学的地位就提高了，作用更大了，人类学自身也获得繁荣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人类学盛行用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等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这些学派缺乏为当时统治者统治殖民地民族所急需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对殖民主义者来说，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与此相反，功能学派从功能观念出发，开创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研究先河。

人类学家从书斋中走出来，纷纷投入田野考察，通过参与式观察或实地观察法，依据实际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力图解决当时世界各地殖民地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

这被认为起到了为当时的殖民统治“挽救危局的作用”，引起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殖民主义统治政府的高度重视，英国等国甚至要求派往殖民地的所有军官必须到大学进行人类学补修。

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人类学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出现了许多研究机构和人名名著、名理论，功能学派是其中之一。

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影响较大的是功能学派。

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认为，为应用人类学提供理论基础的功能学派理论，最适合用来研究中国国情。

他主张人类学应从研究原始民族扩大到研究现代民族，强调人类学为现实服务，其得意门生费孝通就是一个强调并实行人类学为“认识中国”、“改革中国”服务的著名学者，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 &lt;&lt;梁钊韬先生评传&gt;&gt;

梁钊韬创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的初衷之一就是培养一大批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各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

由此不难看出，为现实服务或为国家服务，不仅是国外人类学研究传统之一，也是中国人类学研究发展的成功经验。

近十多年，我多次出国讲学和考察，明显感受到当代欧美人类学参与现实、为现实服务的趋势非常明显。

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交通迅速发展，移民、人口流动加速，各种文化四向横流、交流频繁的新时代，文化不再仅是按地界、国界划分出来的独立系统，文化在都市化和市场化新社会中形成了一个斑驳的混合物。

在世界各国加快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全球化的浪潮中，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渐渐减少以至消失，传统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完全适应急剧变革的新时代。

这也是人类学出现发展人类学分子学科的重要原因：人们认为传统社会正在向现代社会过渡，如果此时我们依然把文化当作“遗迹”、“遗留”来研究，“变得先天不足，需要一种新行当，把文化和发展连在一起，于是产生了发展人类学”。

发展人类学强调人类学在各种发展项目和计划中的决策咨询作用，从而使这些计划、发展项目更适应社会，更符合不同的民族文化，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因此，发展人类学家和应用人类学家在各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发展思路更接近社会，更符合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更容易被各国政府和决策单位接受，从而在各种发展项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各国各地的发展可少走很多弯路。

应用人类学或发展人类学家在发展项目设计和实施中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欢迎。

“1974年，世界银行这个经济学堡垒中只有一位人类学学家，如今社会科学出身的职员已有60来人，每年还有数百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前来做短期顾问。

”同样，世界上其他从事发展项目的机构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

近几年我有幸多次应邀参与了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在中国发展项目的专家咨询评估工作。

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让项目的直接受益者真正参与到项目之中并成为项目的主人。

我们的调查不再仅仅是为了收集材料，写几篇论文或著作，而是为了真实地了解项目地区各族人民对项目的真实看法、愿望、意见等。

这些新的调查方法、目的、思想对人类学的传统研究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要求。

实践使我认识到，中国人类学要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应用研究，离不开为现实服务。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人类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以超自然为本的神学发展观，神的地位淹没了人的地位，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扭曲和黑暗。

资本主义发展后又出现了以物为本或以金钱为本的发展观，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人的本质被再次扭曲、异化。

正确的发展观或科学的发展观应该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观。

无论是“三个代表”的思想，还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都体现了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科学发展观。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的科学。

当前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就应该为研究、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服务，为促进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全面发展献计献策。

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与文艺一样，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

过去，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为殖民统治服务是错误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类学研究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指导研究，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

二是人类学研究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服务，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文明、富裕的多民族社会主义新家园

## <<梁钊韬先生评传>>

而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服务。

从梁钊韬先生和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许多老一辈人类学家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只有当中国人类学研究者把本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时，其研究才有真正的价值和社会影响。

同样，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为现实服务，在现实服务当中才能繁荣和发展。

当代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转型期，处在从传统的手工业和农牧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形势要求我们从科学的发展观出发，从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当前中国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现象，以及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作出科学的调查和论证。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

创新民族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提高驾驭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

特别是要加强对那些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研究，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努力使我们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活动、教学活动、科研成果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激励中国人民，以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精神武器。

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有正确的方向和光辉的未来。

作为一个正在大步迈向经济和社会文化双重进步、繁荣的大国强国，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模式的形成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接轨，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实现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深刻的危机和战略撤退的背景下，中国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并获得巨大成功。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发展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实现与世界各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往来。

一句话，现代化并非只姓“资”，也可以姓“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的现实，呼唤着我们中国人类学家走向田野、走向社会、走进人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和理论，为促进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做出我们应有的科学贡献。

中国的人类学大有可为，大有希望，我想这也是梁钊韬教授生前所期待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前景。

格勒

## <<梁钊韬先生评传>>

### 内容概要

《梁钊韬先生评传》是梁钊韬先生的纪念文集，以此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三十周年献礼。全书分为两部分，“人类赤子，杏坛名儒——梁钊韬先生小传”运用优美的文学笔法，对梁钊韬先生的学术和人生轨迹进行了回顾。

“缅怀梁钊韬先生回忆集”包括了已故地理学家曾昭璇先生、人类学家张寿祺先生，梁先生的弟子黄崇岳、杨鹤书、练铭志、杨耀林、乔晓勤，以及当时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E. Guldin)所写的纪念文章。

各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梁先生的学术研究、性格品质、社会贡献、师恩师德等用饱含真挚感情的笔触进行了追忆。

附录中周大鸣所撰写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发展和研究的概述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该系发展和研究的历史。

这些不但是我们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及其复办者梁钊韬先生的珍贵资料，从中更可窥见一代宗师的治学风范如何历久弥新、激励后人。

特编辑于此，以示对先生的缅怀，兼以飨读者。

## <<梁钊韬先生评传>>

### 作者简介

周大鸣，1958年生，湖南湘潭人，人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专家、美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杂志主编、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从事族群与区域文化、都市与乡村发展研究，主持过国际、国家、省部级课题30余项。

代表作有：《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散工研究》、《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概论》等。



## <<梁钊韬先生评传>>

### 书籍目录

人类赤子。

杏坛名儒

——梁钊韬先生小传

小桥流水花千树，榕荫深处有书香

枪声炮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

桐花万里关山路，天涯辗转酬知音

严谨治学入实地，峥嵘岁月写华章

教书育人多趣事，心胸豁达度劫波

遥遥不畏千程路，厚积薄发话复兴

国际视野兴实学，多重证据求真知

奖掖后进雄心在，发展学科不辞劳

万古江河流日夜，千秋事业有传人

缅怀梁钊韬先生回忆集

梁钊韬先生的主要成

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

Long Live Liang Zhaotao!

爱生如子的师范之德，多科综合的治学之道

——忆恩师梁钊韬教授

梁师在学术上与复办人类学的贡献

梁师领我走上民族史研究之路

岁月无痕记忆可鉴

——缅怀梁钊韬先生

梁钊韬教授与海洋文化研究

附录一 梁钊韬主要著译目录

附录二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附录三 学科恢复以来的人类学研究

——基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论文的分析

后记

## <<梁钊韬先生评传>>

### 章节摘录

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一个老师之难，是现在很难想象的，绝非我们看小说时元帅升帐招兵买马那般容易的情景。

陈启新教授回忆道：“1977年7月17日，我接到梁先生来函，征求我愿否回母校工作。

我与夫人商量后复信表示同意，因为当时我也有归队搞专业的念头。

然而，局领导认为我‘能干’，向市委组织部提出先调入一名大学生作为同意我调出的交换条件，所以，我的档案迟迟未寄出，调动一直在拖延。

梁先生为此而着急，因为亟须调我回校编写《中国民族学概论》教材，协助指导研究生和完成一系列的科研计划。

为加快我的调动步伐，他不但给我写了十多封信，而且向学校和广东省领导写了报告。

如今捧读先生的信，关爱之情仍使我感动。

后在历史系党总支的催促下，几经周折，我才于翌年秋调回中大历史系，正式踏上教研之路。

”不久，梁先生向中大领导提出恢复独立的人类学系，他们同意他拟定一个恢复民族学专业、成立人类学系的计划。

起初，梁先生想申请成立一个包括考古学和民族学两大专业的独立的人类学系，等这个系成熟了，再加上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专业。

尽管中大自己就有权决定成立一个人类学系，但只有教育部才有权批准学校设立新的专业。

如果教育部反对，中大未来的人类学系只能有一个从历史系分出来的考古学专业，那么人类学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

因此，梁先生制定了一个一揽子计划，将新成立系和设立民族学专业都考虑进去。

梁先生和人类学都很幸运，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黄焕秋先生很赞同这一提案。

梁先生还设法利用外界的支持来影响中大领导小组成员。

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林耀华先生在直接提交给中大党委的一封信里所作的陈述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们在行政机构上下的工夫终于取得了效果，1980年，中大党委和行政部门的领导同意了梁先生的计划。

.....



<<梁钊韬先生评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